



中国通商银行旧址

清政府多方筹措军费

战争是一门烧钱的艺术。近代以来,军事行动通常都伴随着金融战争。能否在短期内持久、迅速筹措到大量军费,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

甲午海战爆发前,清政府对战争估计不足,准备也很不充分。李鸿章请求户部拨款二三百万两以作战费,而清政府只拿出了18万两。

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手忙脚乱地开始筹措经费。1894年8月,户部提出停止工程、核扣俸廉、预缴盐厘、酌提运本等紧急措施。此后又提出商行捐输、息借商款等其他举措,办法不可谓不多,但收效甚微。

1894年9月,甲午战争中决定性的黄海海战已经结束,北洋水师覆灭几成定局。

如果在战争后期,清军在陆战中扳回一局,中国还可以少些损失。然而,清政府仍然没有办法筹集到足够军费。

从金融视角看甲午战争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直到今天,不断有学者撰文从政治、外交和军事各个方面探讨晚清战败的原因。从金融史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晚清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一个重要因素乃是现代金融制度的缺乏。

李鸿章建议举借外债,户部以往“息借洋款,多论磅价,折耗实多”为由断然拒绝。户部使尽所有办法筹不到足够军费,最后不得已又只能求助外资银行。

1894年11月,清廷以7%的年息向汇丰银行贷款1000万两。

1895年1月,又向汇丰银行借300万英镑,折银1865万两,年息6%。

这两笔外资银行的借款是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军费的最大来源,然而此时战争已近尾声,清军在辽东战役中没能挽回败局。

在整场战争中,中央与地方总共筹集了6109万两白银,实际用于作战的费用4465万两,其中58%是外债。

日本建立现代金融体系

与晚清不同,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之后,大力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政策,并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现代金融体系。

根据伊藤博文的建议,日本政府于1872年颁布《国立银行条例》,设立国立银行,这是

日本现代金融业的开端。到1889年,日本的现代银行已达218家,类似银行的各种公社达695家,共有资本3189万日元。

除了完备的银行体系(间接金融),日本还建立了证券市场(直接金融)。1878年,明治政府建立东京股票交易所,这就是今天的东京证券交易所。

1894年8月,甲午战争已经爆发,日本政府通过证券市场发行军事公债,预定5000万日元,实际认购达7695万日元,其中各银行应募资金达3000多万美元。明治政府为准备这场战争,早有25000万日元的军事预算,实际使用的军费为22367万日元,折银约15976万两,是中国的近4倍。

通过证券市场募集的资金达11680万日元,占实际军费支出的52%。

为时已晚的醒悟

反观晚清,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还没有一家现代意义上的本土银行。中国虽然有旧式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账局和银号等,但是经营模式陈旧,资本金十分有限,不能为国家筹集大规模资金。

没有现代的金融市场填补军费空缺,财政收入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一下子增加,无奈之下,户部尚书翁同龢建议“开海军报效之例”,向商户借款。

然而当时清政府信誉扫地,没有商人愿意借钱给政府,所谓的“报效”成为清政府变相的勒索。

直至战争结束,京师、直隶两地通过息借商款筹得200万两,山西只筹得40万两,相比外资银行的举债,可谓杯水车薪。

甲午战败,中国面临巨额赔款,清政府此时才进一步明白建立现代金融制度的重要性。

在盛宣怀的努力下,中国通商银行终于在1897年成立,彼时距离日本建立本土的现代银行迟了25年,距离中国出现的第一家现代金融机构——1845年英国人设立的丽如银行已过去半个多世纪。

(据澎湃新闻 丁聘聘、毛子涵/文)

鲜为人知的“平壤利民公司”

设置了四个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某某分公司”。

办事处的工作,一开始就得到陈云的直接指导。萧劲光、朱理治刚到达平壤后,就接到陈云来电,就东北解放区与朝鲜双边贸易及经济合作问题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出席与朝鲜政府的会谈,东北局不再另派人去;在会谈中要提出换入的东西主要是布匹、棉花、鞋子、毯子,还有铁路、煤矿、发电厂所需的火车车头、零件、机器、桥梁材料、油料,以及食盐、火柴等;要相机提议与朝鲜合办纺织厂、鞋厂、火柴厂等;要提出我方在朝鲜设立商店,并一切遵守当地政府法令;要强调保持朝鲜对大连、安东的海陆交通运输线。

陈云在办事处待了五六天,忙着处理朱理治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他和萧劲光一起会见了金日成,商谈双方进一步合作的事宜;他还会见了经平壤准备去图们的大连苏方经济负责人,同他商定北满运往大连交换苏联食盐、布鞋、火车的5000吨麦子、2000吨猪肉的运输路线及在图们的交换问题。

11月23日,陈云和萧劲光等离开平壤,于27日抵达临江。

12月中旬,七道江会议召开,陈云拍板“坚持南满”,为之后不久“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伟大胜利,以及东北战局的彻底扭转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云拍板“坚持南满”

1946年10月31日,东北局经中央批准,决定成立中共南满分局(直辖安东、辽宁、辽南三个省委和大连地委,亦称“辽宁分局”),派陈

人员和物资往来渠道

1946年11月到1947年3月四保临江战役期间,东北民主联军一直将朝鲜作为战略后方,设在朝鲜境内最大的后方基地为楚山(满浦西南方向)。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军事交通史》中记载,在“四保临江”战役中,我军在鸭绿江两岸的军事运输线共有五条,用以保证物资、部队和伤员的运送。其中,第五条运输线在朝鲜境内的水丰、楚山、满浦、中江镇,过鸭绿江到临江。

中共华东局还曾派人入朝通过“利民公司”采购了大量的军事物资。这些物资均从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山东解放区。

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方对朝鲜贸易输出品总额(折合东北流通券)24684万元,输入品总额36526万元。

(摘自《文史精华》2024年第2期 周军/文)

专家解读“胡塞武装袭击美航母”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6月5日称,位于红海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将继续延长在该地区的部署。除了展示美军“保护红海航道”的决心外,此举还有另一层含义——“这艘美国航母没有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

如何证明“艾森豪威尔”号没有在胡塞武装的攻击中受损,已经成为最近让美国海军焦头烂额的舆论风暴。5月30日,美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密集空袭,其中美军战机就是从“艾森豪威尔”号起飞的。作为报复,胡塞武装5月31日宣布向“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并“命中目标”。

单从纸面数据看,胡塞武装的导弹想要突破美国航母打击群的重重防御并命中目标,难度非常高。该航母

打击群由“艾森豪威尔”号航母、“菲律宾海”号巡洋舰以及“格雷夫利”号和“梅森”号两艘驱逐舰组成。“艾森豪威尔”号配备的E-2D舰载预警机能探测5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空中目标。在它的指挥下,“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作为航母打击群的最外层防御,可在800公里外拦截来袭的巡航导弹或无人机。“菲律宾海”号巡洋舰可以协调指挥“格雷夫利”号与“梅森”号驱逐舰发射射程200公里的“标准-2”“标准-3”远程防空导弹。此外,航母打击群各舰还配备“海麻雀”“拉姆”以及“密集阵”等多种中远程防空系统,常规反舰导弹很难突破其拦截。

专家认为,胡塞武装的反舰能力相对薄弱。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指出,该组织拥有6种反舰弹

(摘自《环球时报》)



俄罗斯《消息报》网站5月28日刊发题为《为何乌克兰押注无人艇》的文章,作者是德米特里·博尔坚科夫。

2022年2月24日之后,乌克兰海军所剩无几的力量很快就被消耗殆尽。因此,乌克兰在海上对抗中押注无人艇,目前正在使用的是新一代无人艇(见图)“海婴”。

总的来说,无人艇本身在技术上并不复杂,实际上就是寻常的摩托艇。加装控制系统和有效载荷将其变成一种武器。光电设备与“星链”通信终端和导航系统相结合就是控制系统。无人艇操作员接入由北约卫星、各种侦察和导航手段创建的通用情报和信息领域。无人艇使用惯性制导系统和GPS全球定位系统进入指定区域,然后操作员通过“星链”的视觉引导开始工作。

俄军无人艇上开始安装R-73空空导弹。这是带红外制导弹头的苏联时代的导弹。它出现在无人艇上,迫使俄军直升机机组人员更加小心,并进行反导弹机动,这将降低摧毁敌方浮动目标的可能性。

瑞典可能向乌克兰提供SLWT轻型鱼雷。这种鱼雷于2022年开始生产,可打击水面舰船和潜艇,最大速度超过40节,具有主动和被动制导系统,射程20公里。倘若乌军在“海婴”无人艇上配备这种鱼雷,对俄罗斯的军舰和民用船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据澎湃新闻)

北约武器打击俄本土将引发什么后果

当地时间6月2日,美国官员证实,美方同意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曾警告,一些西方国家提议允许乌克兰使用外国输送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是在“玩火”,会引发“严重后果”。

美西方逐渐取消援乌武器使用限制,会将俄乌冲突引向何方?军事观察员杜文龙认为,美西方此举是出于对俄乌战场态势的考虑,一旦突破这一“红线”,俄乌冲突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此前,乌克兰使用自己的无人机、火箭弹打击俄罗斯境内

目标,在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俄方损失相对较小。如果乌方使用美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装备展开打击,毁伤效果将明显增加。

除了美德两国,丹麦、瑞典等北约国家也纷纷升级对乌援助力度。近日,丹麦当局已允许乌克兰使用其提供的F-16战机攻击俄罗斯领土。

除了美德两国,丹麦、瑞典等北约国家也纷纷升级对乌援助力度。近日,丹麦当局已允许乌克兰使用其提供的F-16战机攻击俄罗斯领土。

杜文龙认为,F-16战机若搭载西方国家的远程武器装备,打击效能将超出预期。

如果F-16战机使用美

国的格斗弹、中距弹与俄罗

斯空天部队战机对决,战果

很可能超出预期。下一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6.7讯)

日本外交“军事化”威胁地区安全

近年来,日本外交“军事化”不断加速。在与美西方军事外交关系上,日本不断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军事互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期间,日美对《日美安保条约》进行了“60余年来最大规模的升级”,重组驻日美军指挥机构,使两国军事同盟实现新的升级;日本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企图为自卫队的海外存在寻找更多立足点,并简化人员和武器装备入境手续;定期参加北约各级别

会议,强化与北约的机制化合作,甚至公开表示欢迎北约在东京设立办事处;加强同奥库斯、“五眼联盟”等美国主导的“小多边”机制的互动……这些动作进一步突破日本和平宪法限制和专守防卫政策,加强了日本与美西方的军事捆绑。

在亚太地区,日本也在持续加大推动军事合作的力度。去年美日韩三方“戴维营会晤”后,日本自卫队就与美韩空军以朝鲜半岛发生危机为假想,举行空中联合军演。三国还于2023年底启动“朝鲜导弹预警信息实时共享体系”。今年4月初,三国空中联演再次在朝鲜半岛附近展开。在美国主导的美日菲机制下,日本还同菲律宾进行《互惠准入协定》谈判,承诺支持菲国防现代化建设。种种行动表明,日本正以东北亚为突破点,形成“以美国及盟友为轴心、辐射亚太、靠拢北约”的军事外交模式,对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严峻考验。

在经济外交方面,日本企图利用多年积淀的优势,走出一条在经济外交中融入更多军事成分的“间接路线”。近年来,日本向“志同道合国家”提供监视警戒雷达等防卫装备;与美英澳等国家签署《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为武器装备出口和军事技术转让开辟通道。日本不断扩大武器出口的范围和规模,经济外交的“军事化”色彩愈发浓厚。

(摘自《解放军报》徐娟娟/文)

乌克兰为何押注无人艇